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展开

李晓兵¹

1 南开大学法学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 2531345935@qq.com

摘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经济产业格局调整、国际政治秩序重塑, 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全球发展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印发实施, 成为中国主动求变、以变应变的重大战略举措。研究从“一国两制”实践创新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双重视角, 系统梳理并阐释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价值与实践逻辑。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既为香港、澳门破解发展难题、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新的战略支撑, 也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内地共担民族复兴历史责任指明了方向。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关制度创新、金融科技合作、法律职业互通等一系列突破性举措, 大湾区建设正推动港澳“一国两制”的实践实现从统一到治理、从区隔到融合、从洗刷民族历史耻辱到共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转型。与此同时, 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深度整合三地产业要素、人力资源与制度优势, 探索区域协同治理新模式, 不仅成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更为全球治理难题的解决和人类社会未来文明生活方式的探索提供了试验田与示范样本。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一国两制”, 区域治理, 历史转型

1 粤港澳大湾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主动求变, 以变应变

2019年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这是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规划近期待至2022年, 远期展望到2035年。转眼之间,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已经两年多了, 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地沉淀和集聚新的产业要素和新的发展能量, 各大中心城市也在不断地刷新着各自发展与转型的纪录。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世界经济产业格局继续不断地发生着深度的调整, 国际政治秩序体系也在经历着深度重塑, 新冠疫情的肆虐和全球传播在给这个世界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同时, 也在推动世界经济产业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体系的调整和重塑不断持续加速。在此背景下,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提出和展开就显得更加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从香港和澳门特区“一国两制”实践发展来看,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和落实实际上为香港和澳门保持繁荣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支撑, 形成了与过去以港澳基本法实施为主要实践模式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格局。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来看,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实施四十年取得巨大历史性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和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特别是在中国面向世界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之后, 围绕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体系中新的角色和新的地位而重新自我赋能、自我超越的深远谋划布局, 这是在世界变局中主动求变、以变应变,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失速的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之源, 在不断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品质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未来的生活探索出新的模式和样态。

作者简介: 李晓兵, 法学博士,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2 粤港澳大湾区：推动“一国两制”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丰富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前言中明确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想的提出是在港澳特区“一国两制”实践日渐丰富的背景下逐渐成型而浮出水面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质性的推进则是在香港和澳门相继迎来回归祖国 20 周年的历史时刻逐渐成为现实并逐步展开的。2017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天，习近平主席还出席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见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协议所确立的合作宗旨提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完善创新合作机制，建立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按照该协议，粤港澳三地将在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下，完善创新合作机制，促进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召开全面总结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香港和澳门特区的治理和“一国两制”实践的发展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中央全面管治权和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还是推动港澳特区实现宪制秩序的重塑，以及夯实宪法和港澳基本法共同构建的宪制基础，港澳特区的治理过程和法治实践实际上已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香港和澳门特区治理和发展的目标与“一国两制”实践的经验亦应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思路和体系中进行总结和阐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并明确指出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党的十九大报告还特别提到，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港澳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发展和丰富。港澳特区和内地人民携手共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共创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实现港澳特区发展与国家发展大局的协调以及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间的深度参与联动，共同分享国家全面进步、繁荣富强和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共同体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荣耀和自豪。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港澳特区治理提出了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其中关于港澳特区治理新的目标的提出，为港澳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丰富，以及港澳特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港澳回归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不仅实现了繁荣稳定发展的基本目标，也在时代发展的大潮推动之下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同时，港澳特区各自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自面临一些新的发展难题和新的社会矛盾，需要以创造性的实践和独特的发展思路来加以应对和化解。党的十九大召开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大幕正在徐徐启动，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香港和澳门特区都需要重新进行自我定位，深刻认识“一国两制”伟大实践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伟大意义，并通过积极的探索为“一国两制”实践寻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在新的历史阶段，香港和澳门特区的“一国两制”实践该如何展开，在全面实施港澳基本法的基础上，如何提升港澳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和层次，如何拓展港澳特区“一国两制”

实践的广度和宽度, 如何保持港澳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开放性和创造性, 这是港澳特区“一国两制”实践走向更大成功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港澳特区的发展与内地的发展实现了全面连接和深度联动, 不仅为港澳特区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为港澳特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还为港澳特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3 粤港澳大湾区: 推动“一国两制”实践实现伟大历史转型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标志着中国正在深度参与新的国际秩序规则的塑造和全球治理的进程,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香港和澳门特区也应该保持开放的胸襟继续积极助力并深度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以港澳特区的发展全力支持国家的发展。同时, 国家发展也为港澳特区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舞台, 既能够为港澳特区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 也能够让港澳特区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香港和澳门特区的创建和“一国两制”实践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全面展开的, 港澳特区是开放的特区, 是不断发展的特区。港澳特区基本法所规定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以及高度自治权的行使决不能成为港澳特区独善其身的借口, 更不能成为自娱自乐、持续与内地相互区隔“偏安一隅”独享发展成果的制度壁垒。在香港和澳门相继迎来回归祖国二十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 港澳特区的“一国两制”实践也必须通过主动的探索完成自身重大的历史转型。港澳特区和内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实现良性互动, 同步发展, 共同进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动, 对于推动港澳特区“一国两制”创造性实践的展开、丰富港澳特区“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有利于深化内地和港澳特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而且有利于港澳特区全面参与国家发展战略, 巩固和提升竞争力, 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而且全面助力香港和澳门特区“一国两制”实践顺利实现从统一到治理、从区隔到融合、从洗刷民族历史耻辱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型。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从粤港、粤澳、港澳三地之间的合作模式探索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启动, 不论是珠三角城市与港澳特区之间的常态化分工合作, 还是设立横琴自贸区开启粤港澳三地合作的新模式, 以及广深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两项世纪工程建成通车实现粤港澳三地之间高标准硬件建设的连接, 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合作安排在西九龙落地实施和粤港澳大湾区在珠海和澳门之间施行“合作查验, 一次放行”新型边检通关模式的探索, 在管理制度方面实现了创新与突破, 包括莲塘/香园围口岸和横琴新口岸大型跨境基建项目相继投入使用, 粤港澳三地之间开辟互联互通新通道; 香港在沪港通、粤港通基础上再实现债券通, 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桥头堡的地位; 科技部、财政部联合推动中央财政资金通过科技计划项目资助形式拨付过境港澳使用; 国家推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港澳居民可在多方面享受与内地居民同等待遇, 让港澳特区居民在内地生活、发展实现深层次融合;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大湾区中心城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 等等, 诸多重大举措密集出台。

伴随着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突出, 香港和澳门特区也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战略发展空间, 从昔日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已经转换成为中国与世界开展高端合作对话的全新的交流平台, 港澳特区以其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角色和作用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香港和澳门特区更加积极主动地助力国家全面开放, 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更加积极地深化与内地之间的融合发展, 共同促进社会整体进步与民生改善, 更加积极地全面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 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和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国际人文交流, 这些都是港澳特区在新的历史阶段创造性地展开“一国两制”实践的应有之义, 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基本主题和重要内容。

2019 年 8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这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这是落实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深圳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对深圳这座应改革开放而快速成长起来的城市进一步赋能和重新定位。深圳城市发展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同频同步,有制度创新和高科技创新的环境和土壤,有高速发展的冲劲和活力,华为、腾讯、大疆等高科技企业为中国在世界创新科技产业竞争中赢得了尊重,以全新的理念推动科技创新和应用引领人类未来生活方式。深圳以其独特的城市精神、发展态势、发展速度、水准和质量成为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以其智慧和贡献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以新的发展思路 and 模式与大湾区其他中心城市一起携手港澳特区共同成长,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是新的历史时期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新实践的创造性之举。

4 粤港澳大湾区: 区域治理、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今天,世界各国都面临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带来的强劲动力和加速发展,曾经被各种力量控制和固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日渐被打破而呈现出自我解构的态势,既有的国际秩序随着新的产业要素和新的经济发展动力的注入而深度重塑,新的全球性的发展和治理难题层出不穷,全球治理赤字不断扩大的趋势日渐明显,建构新的国际秩序的制度规范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日渐迫切。一场影响广泛而深刻、持久而深远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发生,每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和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状况紧密联系、相互交织,大变局为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风险与挑战,影响世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和冲突性显著增加,当前和未来全球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对于每一个国家发展无疑也会带来影响的深远性。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深度谋划、果断决策部署并稳步推进全面展开,这不仅是粤港澳三地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也是国家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实施的重大发展战略。从香港、澳门特区和广东省的发展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粤港澳三地发展的产业要素、人力资源和制度优势进行深度整合,对大湾区各个中心城市的作用和发展方向进行重新厘清定位,并推动粤港澳三地在大湾区层次展开新的区域治理和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未来,粤港澳三地之间便捷高效的互联互通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会继续得到强化和改善,人员、货物、货币、信息等各类产业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会更加通畅,新型经济发展业态的培育和市场一体化水平会持续得到提升,网络共享空间建设、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会大胆探索推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建设会加速推进,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走向纵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也会不断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沉淀新的社会治理方案和经验,催生新的社会形态和秩序规范,这既可以为香港、澳门特区有效治理和创造性地推动“一国两制”实践的发展提供动力之源,还可以为助力“一国两制”实践的伟大历史转型提供新的历史机遇,也将为区域治理、全球治理、国际合作与人类社会新的文明生活方式的探索提供新的试验田和示范地。

The Unfolding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Amids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Li Xiaobing¹

1 School of Law, Taiwan-Hong Kong and Macao Law Research Center, Nankai University,
2531345935@qq.com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ccelerating evolution of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landscap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 and the further exacerbation of global development uncertainty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Outlin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2019 has emerged as a major strategic initiative for China to proactively seek and adapt to chang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elaborates on the core values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the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represents a new practice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he new era. It not only furnishes new strategic support for Hong Kong and Macao to address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sustain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but also charts the course for Hong Kong and Macao to integrate into the overall national development landscape and share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with the mainland. Through a series of groundbreaking measures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interconnection, customs clearance system innovation, financi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ccess for legal professional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is driving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to achieve a great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reunification to governance, from separation to integration, and from washing away the nation's historical humiliation to jointly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Meanwhile, by deeply integrating the industrial factors, human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three region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exploring a new mode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governance. It has not only become a vital platform for China to deepen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but also provides a testing ground and demonstration sample for resolving global governance dilemmas and exploring the future civilized lifestyle of human society.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egional Governanc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